

中国书院的故事

曹华清 别必亮 著



山東直隸出版社

中国书院的故事

曹华清

别必亮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书院的故事 / 曹华清, 别必亮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4-0371-6

I. ①中… II. ①曹…②别… III. ①书院—教育史—中国 IV. ①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3429号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0毫米×228毫米

5.375印张 102幅图 140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指出：“在历史上，书院是研究和传播儒学的文化教育机构。但它有别于官立学校，多半具有民间色彩，因而也比较容易普及。书院虽肇端于中唐之后，然至宋方盛。宋代书院的兴盛，为理学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理学浸盛又反过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事实的确如此，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不仅对传播中华文明、推进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对我国教育、藏书、建筑、学术等文化事业的进步，对民俗民风的培植以及思维习惯与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书院教育历时一千多年，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书院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读书人的文化需求，铸就了由底座到塔身、塔尖的等级之塔，下一级的书院不断地向上一级书院输送生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院教育体系。底层书院分布广、数量多，主要由私立家族书院和民办乡村书院组成，起着普及文化知识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中间层即塔身是县立书院，担负着传播文化知识与儒家思想及秉承朝廷旨意影响民间价值信仰之责；高层的塔尖为州府之类的书院，发挥着指导学术理念政治化、养育学派、更新创造儒家精神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任务，那些由学术大师主持或创建的书院大多如此。

作为教育场所，书院教育虽然也兼顾“举业”，但其根本追求是道德教化和知识传授。为此，书院谨遵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践行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书院将其制度化成为章程、学规等形式，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要求生徒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南宋以后，许多书院都遵循这一学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又补充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

书院诞生之初就与修书、藏书紧密相联。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3060部，51852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大大超过了前代。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丽正修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书院都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书院建有藏书楼、尊经阁等，藏书种类多为经籍，一般采用经史子集“四部法”进行分类排列，编有书本式目录以便查检，如岳麓书院曾先后有《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三部藏书目录；藏书由书史或专人负责管理，利用“悬榜”的方法，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闾邑多士”，“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书院藏书来源主要有：朝廷赐书；督抚等地方官捐赠；地方豪绅、社会贤达及书院肄业生徒捐赠；地方官统一购书后分发；收藏书院山长、生徒所著书籍或校勘的书籍；书院自行刊刻的书籍与版片。书院刻书印书的主要办法是：设局刻书，刊印经史著作和书院师生研习所得，刊印阅读参考书籍，包括学生课卷、课艺、论文、老师讲义、书院学规、章程、方志、先贤遗著等。

古代书院设置的地点一般选择的环境宁静、景色秀丽、绿水近绕的名山大川。书院的建造蕴含着深厚的山水人文的审美情趣，足发圣贤玄奥，以

利澄心治学，正如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清舍，以为群讲习之所。”经过精心创意与规划建造的书院，不仅巧借山川形胜之美，而且还汇集了楼台亭榭等人工景致之胜。

书院建筑十分讲究中和、平易、含蓄的传统审美情趣。宫、庙殿、堂、楼、馆、轩、舍、斋、廊、阁、阙、亭、台、坛、榭、坊、桥、园等种类繁多，按其性质和用途，可以分为祭祀纪念性建筑、讲学建筑、藏书建筑、生活居住建筑及供师生游人憩息的园林建筑等类别。祭祀建筑主要用来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书院创始人先贤大师及其学脉传人，有文庙、供祠等；讲学建筑主要包括讲堂及大门、牌坊、石碑、学斋等；藏书建筑有藏书楼、尊经阁、典籍室等；生活居住建筑包括先生住的精舍、生徒住的学舍及饭堂、厨房等；园林建筑主要有月河、石桥、泮池、亭台、廊轩等。在建筑的布局上，受官学“左庙右学”形制的影响，一般左侧为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堂庙和祭祠，其后为藏书的楼阁；右侧为泮池、石桥、讲堂等。各地的书院所处地域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建筑风格，如，金台书院属京派风格，嵩阳书院属中原风格，东林书院、学道书院属江南风格，岳麓书院属湖湘风格，尼山书院属齐鲁风格，白鹿洞书院属江西风格，关书院属陕西风格等。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读书、讲学授徒的文化组织，推动了我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在这一组织中，相对宽松且独立自由的办学环境、纷至沓来的学术大师、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的脑力激荡场，使我国古代书院成为学术创新的思想高地。宋代的程颐、程颢、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湛若水、王艮、钱德洪，清代的汉学大师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的。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三次高潮，即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1901年，光绪帝一纸诏令，改书院为学堂。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感慨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事易时移，书院在人们的视野中已然淡去，但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人们又开始期待复兴书院，期望以书院的师徒授受方式，来加强对人的教化养成；寄望用这种“野蛮”自在的方式冲撞刻板的学术藩篱，为民间思想者提供创新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写作了这部《中国书院的故事》，以期为人们追忆书院历史、从古代书院中吸取办学

智慧打开一扇窗。全书分为书院成长轨迹、书院名人寻踪、书院名院集萃三个部分。

在“书院成长轨迹”部分，讲述了书院从诞生到成熟再到归于沉寂的曲折历史。唐朝官方的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书院）及民间的光石山书院、瀛洲书院、李公书院、张说书院等，从官、民两方面同时宣告了书院的诞生，一种新型文化组织的星星之火悄然点燃。在五代离乱的环境里，许多文化人避入山林，聚徒讲学，民间书院由个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逐渐向讲学机构转变。两宋是书院的发展成熟期，尽管发展的过程有曲折，但理学大师的偏爱及帝王的奖赐还是让书院走向兴盛，其数量剧增，规制完备，形成了崇圣崇道、兼容并蓄、独立自主之书院精神，书院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教育组织。元朝书院在宋遗民的坚守和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延续了两宋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北方书院的迅速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北移奠定了基础。书院在明朝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大起大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两百多年，明朝前期的打压政策让书院在低谷徘徊了百余年，从正德到万历年间，书院踩着王湛心学兴盛的节奏，迅速走向辉煌，辉煌也是灾难的开始，从嘉靖到天启，书院数次罹祸，惨遭禁毁，伤痕累累。清朝从顺治十四年（1652）起，书院开始复苏，此后即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清朝的书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前朝都只能望其项背。然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正表演到高潮的书院突然谢幕，1901年朝廷下旨改书院为学堂，书院退到了历史的帷幕之中。

在“书院名人寻踪”部分，以16个人物为典型，勾勒了书院里一群为学术、为教育、为国家发展不懈追求的人物群像。才学超群的张说是“集贤十八学士”的代表，也是书院修史、藏书功能的开创者；泰山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不仅是同学共事，更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他们推崇儒家的圣人之道，是理学先驱；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酷爱莲花，清廉正直、淡泊实诚正是他为官、为学、为人的写照，从周敦颐开始，书院成了传播理学的重要阵地；程颢和程颐为同胞兄弟，都师从周敦颐、邵雍父子等，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后来又分别在明道书院和伊川书院传播其学术思想——“洛学”；朱熹、张栻和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们是同时代可以并驾齐驱的理学大师，学识宏博，影响深远，朱熹创立了“朱学”，张栻是“湘湖学派”形成的关键人物，吕祖谦则是“婺学”的宗师，三人都在书院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吕祖谦兄弟的丽泽书院都是中国古代书院史上浓墨重彩一笔；元代南吴北许二先生，撑起了元代理学的一片天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心学大师王守

仁是一个奇才，战场上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书院里他潜心悟道、循循善诱；东林先生顾宪成冲破明末陷入玄虚极端的心学樊篱，开创了“事事关心”的东林书院崭新学风；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以两千多万字的宏大著述站在了中华文化的高峰，以对君主专制的尖锐批评而成为中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以在甬上证人书院等地的讲学形成了独特的学风和精神追求；颜元执着地实践其实学教育理想，并在漳南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人物留下了一个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程门立雪、划粥割齑、如坐春风等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境界。

在“书院名院集萃”部分，以历史公案“四大书院”开篇，主要介绍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等在“公案”中所涉及到的著名书院。“四大书院公案”中还提到了徂徕书院、茅山（金山）书院因存在的时间较短，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多，因此未记入。鹅湖书院虽未列入四大书院，但因两次鹅湖之会让它在书院史上熠熠生辉：朱熹与陆九渊兄弟鞭辟入里的哲学阐释和智慧碰撞、辛弃疾与陈亮的剑胆琴心和忧国忧民情怀，都让我们对鹅湖书院肃然起敬。此外，还特别介绍了正音书院，它独具特色，其功能就是推广官话。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书院，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也无论其规模的大小，都为造就我国古代书院的辉煌留下了值得记忆的一笔。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让我们一起走进书院，走进我们祖先创造的这段灿若星河的历史吧。

目 录

第一部分 书院成长轨迹 / 1

- 一、唐书院——呱呱坠地，开创新篇 / 1
- 二、五代十国书院——潜德幽光，后必大兴 / 5
- 三、两宋书院——发展成熟，空前辉煌 / 6
- 四、元书院——顺势而为，向北发展 / 19
- 五、明书院——一波三折，大起大落 / 27
- 六、清书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39

第二部分 书院名人寻踪 / 55

- 一、集贤十八学士 / 55
- 二、泰山书院里的宋初三先生 / 58
- 三、濂溪先生周敦颐 / 63
- 四、理学泰斗“二程” / 66
- 五、南宋“东南三贤” / 73
- 六、元代南吴北许二先生 / 87
- 七、一“心”“致良知”的王守仁 / 91
- 八、东林先生顾宪成 / 100
- 九、证人书院黄宗羲 / 103
- 十、颜元与漳南书院 / 108

第三部分 书院名院集萃 / 115

- 一、四大书院，历史公案 / 115
- 二、千年岳麓，高山仰止 / 118
- 三、洙泗心传之白鹿洞书院 / 124
- 四、山水形胜之石鼓书院 / 132
- 五、闹中取静之应天府书院 / 136
- 六、尘消智朗之嵩阳书院 / 140
- 七、心学阵地之象山书院 / 143
- 八、聚朋论道之丽泽书院 / 147
- 九、顿渐同归之鹅湖书院 / 149
- 十、“推普”学校之正音书院 / 155

后 记 / 159

第一部分 书院成长轨迹

书院诞生于何时？南宋陈傅良言：“以余所闻，汉初郡国往往有夫子庙而无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员，其学士尝课试供养与否，阙不见传记。然诸儒以明经教于其间，率从之者数十百人，辄以名其家，齐鲁燕赵之间，诗书礼易春秋论，论家各盛甚，则今书院近之也。”（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由是可见，书院源远流长。不过，书院名称的真正出现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有唐一代。

一、唐书院——呱呱坠地，开创新篇

众所周知，繁荣与开放铸就了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唐朝，在开放的胸襟下，唐朝在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方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其永世留芳的诗、书、画，还因为它创造了书院——这样一种经千余年发展而兼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

尽管有人提出，“唐朝是否有名符其实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这一判断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概念，即名符其实的书院应当是一种教育机构。然而，如果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那么，完全可以确认中国古代书院诞生于唐

代：一个因素是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生的书院在功能、规制、制度等方面都有一个发展完备过程；另一个因素是将书院视为文化传承与创生的文化组织，而不仅仅是教育机构。

（一）官方书院的开端

一般认为，唐代书院发端于丽正书院的设置。清人袁枚在《随园笔记》卷一四中记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集贤书院（开元六年，718），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唐玄宗开元五年，朝廷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修书行动。为使修书工作顺利开展，开元六年，将所采之书迁到东宫丽正殿，并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作为官方的修书机构正式成立。书院的主管人员“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也有观点认为丽正书院之名始于开元十一年（《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此后不久，又在京师长安及东都洛阳建立了两所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于集仙殿赐宴张说等大臣，君臣相谈甚欢，情随境生，性之所至，由集仙而思集贤，下诏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取意为集贤纳士以济当世。东宫、京师、东都三所丽正书院至此都更名为集贤书院，此后，又先后创设了兴庆宫集贤院和华清宫集贤院。

从丽正到集贤，唐代书院经历了创立后的第一次嬗变。丽正书院主要是修书之所，集贤书院则将修图书、集贤士、讲学论道等多种活动融为一体。搜书、校书、写书、藏书是集贤书院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主要的活动。



集贤书院门楼内侧

集贤书院广搜天下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抄录辑佚，在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方面写下了重要一笔。据《唐六典》记载，集贤出的书“皆御本也。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丙，为子；四曰丁，为集。故分

为四库……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张九龄等原著《唐六典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对于当时集贤院刊辑古今经籍盛况，《唐会要》、新旧《唐书》等也都有详细记载。

诵诗论道、资政垂询是集贤书院的又一重要活动。文人雅士，聚集一堂，诗赋相和，自不待言，甚至还集结出版了《集贤院壁记诗》2卷。依托集贤院藏书多、学者多的优势，集贤书院充当了皇帝的顾问，蒋乂应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史料记载：蒋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征引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一四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2页）“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辨明邦国大典，以备皇帝应对是当时集贤书院的一种常态。

集贤书院不仅集经籍，也纳贤才，“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张九龄等原著《唐六典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这从其招揽的后来被神化为八仙之首的张果老入集贤院即可见一斑。张果老这一名号可谓家喻户晓，但他曾入集贤院却鲜有人知。据欧阳修的《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听说隐居中条山的张果为神异之人，于开元二十一年派通事舍人裴晤前往召纳，未果；“帝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邀礼”，这一次前去邀请之人不仅官阶高了，而且还带着皇帝的亲笔信，总算将张果请入了东都集贤院（欧阳修《新唐书》卷二〇四）。

总之，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官方正式以书院之名所设置的学术文化机构，将它们作为中国古代书院之始应该不无道理。



张果老

（二）民间书院之发初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书院是草根化、个性化的文化组织，带有更多私人的、民间的色彩，而非官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书院的滥觞之地应在民间。根据邓洪波的考证，唐代书院的开端并非前述的官办丽正、集贤书院，而是民间创办的，攸县的光石山书院和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一起，要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了。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页）。

对于这四所民间书院，史载较略。光石山书院仅在苏师道的《司空山记》中提及，即“司空宅在山之西……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

（司空山原名麒麟山，传说因南齐司空张岳在此修道成仙，遂更名为司空山，天宝十四年，潭州刺史苏师道来此祈雨抗旱，参观了司空山的仙踪遗迹后，作《司空山记》）。另三所书院见于当地方志。关于瀛洲书院，《陕西通志》卷二七记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明弘治时，知县任文献重修”；李公书院在嘉靖《青州府志》和《临朐县志》中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即李公书院是“李靖读书处。又云靖从太宗征闰左，于此阅司马兵法”（嘉靖《青州府志》卷九、《临朐县志》卷四），也就是说李公书院是唐初帮助李唐定天下的文武全才李靖读书或习兵法战术的地方；张说书院见于《保定郡志》，称张说在未出仕前，“过满城，筑书院于花阳山，以为藏修之所，后人名其居曰张相公堂”，张说书院初建时，只是张说收藏图书、研习学问之处。唐初这四所书院除光石山书院语焉不详外，另三所书院都是特定个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如果将书院定义为学术文化组织，那么，这几所书院仅仅可以视为是中国书院的雏形。

中国古代书院成长的第一个里程碑当属松洲书院。松洲书院位于今福建漳州，是“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福建通志》卷六四）。这九个字告诉我们：松洲书院已超越了个人藏书、读书治学之所，而成为聚徒授学之馆。陈珣是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之子，16岁（696）即举明经及第，授职翰林承旨直学士，少年有为，但他不满武后称帝，朝廷昏乱，因此郁郁寡欢。任职12年后，借口双亲年迈，上疏请求返乡奉养双亲。回乡后，龙溪县令聘请他主持乡校，建松洲书院（时在708年）。陈珣在书院“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珣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至开元二十五年（736）陈珣重入官场。开元二十五年，陈珣上疏乞休，再到松洲书院聚徒讲学。归纳以上叙述，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松洲书院不是个人修身之地，而是带有学校性质的教学场所，其教学对象是士民及生徒；其二是松洲书院创办目的不是应科举试，而是在“州治初建，俗固陋”的背景下，试图通过讲论典礼，教化乡里，移风易俗；其三是陈珣的讲学旨在化民成俗，这正是后世诸多书院的主持人所持的精神。松洲书院的这三个突出特点，使得其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到唐朝中后期时，书院已如星星之火，撒播在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的多个省区。根据邓洪波的统计，当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共有书院近五十所（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第26页）。只是这些书院中，大多数只是士人读书治学之处，同时接纳朋友访客，谈诗论道。正是由于其广纳朋友，弘扬文化，因此，书院不再是私人书斋，而是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崭新文化机构。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书院是构筑这一高峰的众多元素之一。尽管如此，在书院的发展史上，有唐一代的书院也只能算是萌芽罢了。

二、五代十国书院——潜德幽光，后必大兴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战乱不休、朝代频换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是野心家、阴谋家的天下，他们僭越礼制，分裂割据，征战连连。战乱环境对文化遗产与教育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挑战着文人的操守与信念。

在唐末至宋初的半个世纪里，地方的官学被废止，教育没落，文化危机。离乱中的文人士子结庐山中，开馆授徒，拯救斯文于不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官学不兴，给了私学性质的书院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生存价值。

唐末五代，为避战火，文化人大量迁徙到远离尘嚣的僻静山野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原已在山野间的佛道二教，趁此机会广招信徒，升坛讲学；二是不信佛道的士人则自发组织起来，研习经文，建舍讲学。不少后来很有名的书院都渊源于此。如岳麓书院即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当时岳麓山寺庵林立，到山中留宿的文人日益增多，山中的和尚即为这些文人另建书院，让他们有屋住、有书读，还可以交流讲学。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

根据邓洪波的统计，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共有13所，分别是北京的窦氏书院；河南的太乙书院和龙门书院；江西的留张书院、匡山书院、梧桐书院、华林书



龙门书院

院、兴贤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和东佳书院；福建的蓝田书院；广东的天衢书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匡山书院。匡山书院也可看作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得到皇帝表彰的第一个书院，标志着官方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后唐端明殿学士罗韬力辞学士之职，回归故里，在吉州泰和县东匡山下办匡山书院。后唐皇帝李嗣源为匡山书院颁赐院额，并发文大加表彰，文曰“后学从云，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地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凤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神未必无小补焉！”（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受到表彰的匡山书院在宋元时期仍兴学不断。

在中国古代书院的成长历程中，五代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与唐代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不同，五代时期的书院大多招徒讲学，已具有一定的学校性质，在拯救斯文、传播文化、净化民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匡山书院得到皇帝下文表彰，标志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三，由于五代书院大多为避战乱兴建于山野之间，为维持书院生存，书院师生必须开垦荒地以求自给，这是一种新型读书方式，江堤称其为“书院耕读时代”（江堤《书院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后世书院的田产则主要是官府赐予和私人捐赠。

此外，五代书院创办者的独立文化品格及开拓精神，使战乱的黑暗中有了希望，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钱穆《五代时之书院》）

不过，五代时期仍是书院的幼年时期，因其书院数太少，全国仅13所，影响范围毕竟有限。书院真正走向成熟是在两宋。

三、两宋书院——发展成熟，空前辉煌

就书院的发展来说，两宋时期称得上是黄金时期。经过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学术大师的执着追求，书院走到了成熟阶段。这一时期，书

院数量剧增，规制完备，形成了崇圣崇道、兼容并蓄、独立自由之书院精神，书院与官学并立，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教育组织。

（一）北宋书院：前后两重天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从960年到1126年为北宋时期，共167年。就北宋的教育而言，以1044年的庆历兴学为界，前后各八十余年。书院在前后八十余年的命运很不相同，简直就是两重天。

1. 北宋初年的书院勃兴

北宋初（庆历兴学前的八十余年），书院得到长足发展。其发展表现在：首先，书院数量较多，到仁宗朝时，有书院29所（部分书院的具体办学年份不确定而未计，因此实际数字可能不止29所）；其次，书院名气大，出现了一批影响悠远、名耀史册的著名书院，如岳麓、石鼓、睢阳、白鹿洞、嵩阳、徂徕、茅山等书院；第三，朝廷大肆褒奖，赐田、赐额、赐书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书院的兴盛状况，从太宗至仁宗的六十余年间，皇帝及地方对书院的褒奖赏赐达二十余次。吕祖谦所言之“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吕祖谦《白鹿洞书院集》之《东莱集》卷六），也可见宋初书院大师聚徒讲学之盛况。

为什么北宋初年有如此兴盛的书院景象？原因有四：

首先，北宋初年官学不兴与科举举额扩大构成一对矛盾。宋太祖以武夺天下后，希望偃武兴文，巩固统治，因而大大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如开宝三年（970）原只取进士8人，结果太祖见未及第人太多，又赐106人出身；真宗咸平三年（1000），赵恒亲试，共取各科登第者1800人。李才栋先生称宋科考是“严其考试，广其名额，厚其荣禄”，致使读书人对科考是趋之若鹜。对于读书科考的好处，真宗皇帝的《劝学诗》讲得淋漓尽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宋真宗